



凤凰文库·历史研究系列



JINDAI YILAI RIBEN DE ZHONGGUOGUAN
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

杨栋梁 主编

第三卷 (1840—1895)

刘岳兵 著



凤凰文库·历史研究系列



JINDAI YILAI RIBEN DE ZHONGGUO GUAN

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

杨栋梁 主编

第三卷 (1840—1895)

刘岳兵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 第3卷, 1840—1895/刘岳兵著.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2. 5

(凤凰文库. 历史研究系列)

ISBN 978-7-214-08157-5

I. ①近… II. ①刘… III. ①汉学—历史—日本—1840—1895②对华政策—研究—日本—1840—1895 IV. ①K207.8②D829.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88256 号

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

杨栋梁 主编

第三卷(1840—1895)

刘岳兵 著

-
- | | |
|---------|--|
| 策 划 编 辑 | 王保顶 |
| 责 任 编 辑 | 王翔宇 王保顶 |
| 装 帧 设 计 | 黄 炜 |
| 出 版 发 行 |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 |
| 集 团 地 址 |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
| 集 团 网 址 | http://www.ppm.cn |
| 出版社地址 |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
| 出版社网址 | http://www.book-wind.com
http://jsrmcbs.tmall.com |
| 经 销 |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 照 排 |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
| 印 刷 |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
| 开 本 | 960 毫米×1 304 毫米 1/32 |
| 印 张 | 16.25 插页 4 |
| 字 数 | 415 千字 |
| 版 次 |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
| 标 准 书 号 | ISBN 978-7-214-08157-5 |
| 定 价 | 45.00 元 |
-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出版说明

要支撑起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除了经济、制度、科技、教育等力量之外,还需要先进的、强有力的文化力量。凤凰文库的出版宗旨是:忠实记载当代国内外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促进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为推动我国先进文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丰富的实践总结、珍贵的价值理念、有益的学术参考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资源。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人类文化的高端和前沿,放眼世界,具有全球胸怀和国际视野。经济全球化的背后是不同文化的冲撞与交融,是不同思想的激荡与扬弃,是不同文明的竞争和共存。从历史进化的角度来看,交融、扬弃、共存是大趋势,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总是在坚持自我特质的同时,向其他民族、其他国家吸取异质文化的养分,从而与时俱进,发展壮大。文库将积极采撷当今世界优秀文化成果,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建设,面向全国,具有时代精神和中国气派。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背后是国民素质的现代化,是现代文明的培育,是先进文化的发

展。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中华民族必将展示新的实践,产生新的经验,形成新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文库将展现中国现代化的新实践和新总结,成为中国学术界、思想界和理论界创新平台。

凤凰文库的基本特征是: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中心,立足传播新知识,介绍新思潮,树立新观念,建设新学科,着力出版当代国内外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的最新成果,以及文学艺术的精品力作,同时也注重推出以新的形式、新的观念呈现我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优秀作品,从而把引进吸收和自主创新结合起来,并促进传统优秀文化的现代转型。

凤凰文库努力实现知识学术传播和思想理论创新的融合,以若干主题系列的形式呈现,并且是一个开放式的结构。它将围绕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中国化、政治学、哲学、宗教、人文与社会、海外中国研究、外国现当代文学等领域设计规划主题系列,并不断在内容上加以充实;同时,文库还将围绕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领域的新问题、新动向,分批设计规划出新的主题系列,增强文库思想的活力和学术的丰富性。

从中国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这样一个大视角出发,从中国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浪潮中的独特性出发,中国已经并将更加鲜明地表现自己特有的实践、经验和路径,形成独特的学术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这是我们出版凤凰文库的信心之所在。因此,我们相信,在全国学术界、思想界、理论界的支持和参与下,在广大读者的帮助和关心下,凤凰文库一定会成为深为社会各界欢迎的大型丛书,在中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中,实现凤凰出版人的历史责任和使命。

凤凰文库出版委员会

目 录

引言:近代日本中国认识的原型及其变化机制 1

- 一 问题之所在 1
- 二 一个典型的例子:佐藤信渊的中国认识 3
- 三 中国认识变化的机制之一:对象化中国 7
- 四 中国认识变化的机制之二:类型化中国 16
- 五 简单的结语 28

第一章 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日本中国观的几种主要类型 30

- 一 殷鉴论 31
- 二 唇齿论 36
- 三 敌对论 40
- 四 亲善论 44

第二章 从“臆测”到实证 51

- 一 古贺侗庵的《海防臆测》与《鸦片酿变记》 52
- 二 洋学者的视线:渡边华山与高野长英 60
- 三 鸦片战争之后日本儒者及志士的中国观 64
- 四 幕府“千岁丸”上海之行与实证的中国观的形成 76

补论:近代日本的立宪政体与中国——以加藤弘之的《邻草》为例 85

第三章 作为“经略”的“修好”	107
一 “万国对峙”与“万国并立”	107
二 《中日修好条规》(上):“修好”的交涉	117
三 《中日修好条规》(下):“修好”的种种“如意算盘”	166
四 出兵台湾:无理取闹的得逞	216
第四章 “可侮”与“不可侮”之间:以福泽谕吉为中心	229
一 舆论界“可侮”与“不可侮”的讨论	229
二 福泽谕吉的中国认识(上):《文明论之概略》以前的中国认识	239
三 福泽谕吉的中国认识(中):《文明论之概略》中的中国认识	245
四 福泽谕吉的中国认识(下):走向《脱亚论》	258
第五章 蔑视中国的普及化	291
一 从《征讨清国策案》到甲午战争的爆发	291
二 蔑视中国的普及化(一):竹越与三郎的《支那论》与德富苏峰的《大日本膨胀论》	331
三 蔑视中国的普及化(二):荒尾精的《对清意见》与尾崎行雄的《支那处分案》	353
四 蔑视中国的普及化(三):歌曲与漫画中的中国丑化管窥	375
结语:由胜海舟的中国认识所想到的——与松浦玲先生商榷	389
一 所谓胜海舟自始至终反对日清战争	391
二 “尧舜的政治”真意何在?	397
三 胜海舟与丁汝昌、康有为	403
四 “所谓历史,实在是难呀。”	413
人名索引	422
征引及参考文献	430
相关事项年表	443
附录:近世至明治时期日本的台湾认识(田中梓都美)	465
后记	504

引言：近代日本中国认识的原型及其变化机制

一 问题之所在

中日之间的相互认识是中日关系史研究的重要课题。相互认识如何,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确立何种相互关系的前提。相互认识当然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它的形成会受到相互交流的程度、各自历史的状况、国际形势的变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在日本近代化过程中,中国因素对于日本所经历的成功与挫折及其在国际舞台上地位的变化可以说是一种关键性的存在,研究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不仅有助于反思历史,而且对于构筑理性的中日关系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对近代日本中国认识的研究,已经有不少成果。在日本较早的比较系统的研究,是通过近代日本各个领域的典型人物的中国的经验或中国观的分析反思日本近代化进程。^①此后,有对近代日本中国认识的类

① 竹内好、桥川文三编:《近代日本と中国》(上、下),东京:朝日新闻社,1974年。

型进行研究的^①,也有对近代日本中国认识的变迁进行研究的^②,还有人指出对现实中国的侮蔑和对古代中国的尊崇是“明治以来形成的日本人对中国认识的二重构造”的^③。近年来,从日本与亚洲各地区的双向交流视角来重新认识亚洲,其中包括重新认识中国,成为学界共同关心的话题。^④ 2006年12月,中国教育部批准了以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杨栋梁教授为首席专家的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近代以来日本对华认识及其行动选择研究”,课题组力图追溯日本近世(德川幕府中后期)以来对华观的变化,系统地考察和梳理近代社会转型期日本对华观变动的轨迹。在日本的中国认识这一研究课题上,将近世与近代联系起来考察,是很有意义的。本文的主旨即是在这一思路的基础上,一方面考察在近代以前日本社会中就已经开始存在的中国认识的原型,以便说明近代日本中国认识的各种类型渊源有自。另一方面,许多研究者将日本中国认识的变

① 野村浩一的《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张学锋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作者在《中文版序》中也明确表示“本书可以说对近代日本所产生的各种类型的中国认识观作了一个比较全面的总结”。中国学者的论著多以类型论为主,如钱婉约的《近代日本的中国观》(见其《从汉学到中国学——近代日本的中国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等。

② 如陶德民在《明治の漢学者と中国——安繹・天因・湖南の外交論策》(大阪:関西大学出版部,2007年)中以明治的汉学家为例,分析了其中国认识从“邻人”(“同文同种”的邻国)意识到“监护人”意识的变化过程。而对所谓“监护人”意识,又指出其有时起“反哺”作用,有时起“反噬”作用。对该书的评论有钱婉约的《当代日本汉学研究的启示》,见《中国图书评论》(北京),2008年第4期。

③ 安藤彦太郎:《中国语和近代日本》,张威忠译,济南:济南出版社,1989年,第37页。尾崎秀实早在《现代支那论》(岩波新书,1939年)就认识到:“我们通过汉文所想像而描绘出来的支那社会,与现实的支那社会的隔阂之大,几乎没有任何联系。而且忘掉几千年的事实上的飞跃、隔阂,而将其作为理解现实支那的唯一尺度所常常出现的错觉和造成的误会,是最大的问题。可以说几乎从来都没有为将古典的支那社会和现代支那社会衔接起来而付出巨大的努力。”(《尾崎秀实著作集》第二卷,东京:劲草书房,1977年,第197页。)

④ 这方面的代表作有:山室信一的《思想課題としてのアジア》(东京:岩波书店,2001年)、岩波讲座《“帝国”日本の学知》(共8卷)中的第3卷《東洋学の磁場》(岸本美绪编,岩波书店,2006年)等。

化,概括为从崇拜中国到蔑视中国的转变^①,而其转变的契机,或者认为是 1840 年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②,或者认为是 1862 年幕府向上海派遣“千岁丸”之事^③,或者认为是明治维新的成功。这些说法在理论上只是将中国的变化,准确地说是将中国的失败和日本的成功“两国的力量对比”作为日本的中国认识变化的基准。其困难在于,它无法解释早在鸦片战争之前日本就已经存在了强烈的蔑视中国的认识这一事实。因此,有必要重新思考日本各种中国认识的变化机制。

二 一个典型的例子:佐藤信渊的中国认识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中国认识中的所谓“同盟论”、“征服论”和“保全论”这些有代表性的观点,在幕末同一个思想家不同时期的著作中都鲜明地表现了出来。这使我们看到,尽管历史时代不同,但对中国的认识却有惊人的相似。这个思想家就是佐藤信渊(1769—1850)。

佐藤信渊是幕末日本有名的经世家,他的思想深受儒学、洋学和国学的影响,农本主义和重商主义、封建制的维持和新的统一国家的构想、科学的性格和非科学的见解、开明的思想和反



佐藤信渊像

-
- ① 杨栋梁、王美平的《近代社会转型期日本对华观的变迁》(《日本研究》(沈阳),2008 年第 3 期)分“‘仰慕型’对华观的分化”、“‘平视型’对华观的显现”、“‘蔑视型’对华观的确立”三个阶段,力图从总体上考察和梳理自德川中后期(即日本史上所说的“近世时期”)以来日本对华观的变化,描绘出近代社会转型期日本对华观变动的轨迹,很有参考意义。
- ② 佐藤三郎:《近代日中交涉史の研究》,东京:吉川弘文馆,1984 年,第 70 页。又,小岛晋治:《日本人的中国観の変化——幕末、维新期を中心に》,《近代中日関係史断章》,东京:岩波书店,2008 年,第 20、26 页。
- ③ 日比野丈夫:《幕末日本における中国観の変化》,《大手前女子大学論集》(西宮),第 20 号,1986 年 11 月。

动的非科学的迷妄,这些相反的思想倾向不可思议地在他的著作中混淆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特异的思想形态。^① 他的思想可以说是丸山真男所谓的“原本存在于日本人精神状况中的杂居的无序性”的一个很好的注释。^②

1807年,幕府针对俄罗斯船只的骚扰和要求通商的威胁,12月下达了驱逐俄罗斯船只的命令。这时,佐藤信渊被聘为德岛藩的幕僚,讲授兵学。第二年他著述了许多兵学和海防著作,其中《防海策》(1808年)的中国观很有代表性。他说,日本是洋中的大岛,若兴航海、通商之业,那么日本就是世界上最为便利的国家。而“首先要遣使与清朝、安南、暹罗诸国,厚其礼而丰其聘以结和亲。……以通有无、收互市之利”,主张对俄罗斯进行打击,夺取堪察加半岛以绝后患。而对中国则在心存警戒的同时希望拉拢结为同盟。他说:“大清国强大而且临近,万一出现狡猾之主而兴兼并之志,其患之大非俄罗斯所能比。因此对此大清国即便费卑辞厚聘,也要将其变成盟国,通交易以收互市之利,乃今世之要务。”^③就是说,为了对付俄罗斯,而主张不惜代价与中国结为盟国。

此后,在1815年,他师从国学家平田笃胤,并随幕府公认的神道家吉川源十郎学习神道,这对他的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影响。1823年的《宇内混同大论》和《宇内混同秘策》充分体现了这种影响。他反复强调“皇国”日本是世界万国的根本,或世界万国以日本为根本。如何使皇国日本实现成为统领全地球的宗主国的目标,他认为使中国臣服是一个重要的基础。为此,他提出了侵占中国东北和江南的种种“秘策”,如他说:

西征之先阵,为从小琉球先攻取台湾岛,以此为西略的基础,进而可经略支那国的浙江以南诸州。又以二万人为后阵,通过声援先

① 岛崎隆夫:《佐藤信渊》,《安藤昌益 佐藤信渊》,日本思想大系45,东京:岩波书店,1977年,第605页。

② 丸山真男:《日本的思想》(区建英、刘岳兵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64页。

③ 鸕田惠吉编:《佐藤信渊选集》,东京:读书新报社出版部,1943年,第327、332页。

阵，先攻取岸州（疑为崖州。珠崖，指海南岛——引者），进而可使经略岭南诸州。如上所云，青森府的精兵二万，从数年前取黑龙江之地，仙台府之兵二万许也作为青森府的援助，可攻取满洲之地。沼垂府之兵四万、金泽府之兵四万，各分半而发，以四万许精兵，攻取混同江（松花江汇合黑龙江以后称混同江）、吉林城等地，会合右四府的兵力，且又抚御新附的夷狄之众，进而可经略盛京。……盛京如果已经危急，其王城北京顺天府也必定骚扰如鼎沸。仔细权衡各方兵力，如果探到支那人已经困穷，熊本府之兵再加以亲征的皇军共八万余人，直渡西海，可以攻取江南之地。然后此府之兵六万余人如果能征服南方诸州，则江汉以南其势土崩瓦解，皇军可所向披靡。已经取得州郡之后，大施仁德以抚纳新附的支那人。先立朱氏（皇国明之苗裔甚多，我的亲戚即有一个明之朱氏）一人，封明室之后，厚祭其先祖宗庙，且登用有文才的支那人，令其作制令，以原来皇国讨伐满、清是因明朝遗族之愿请而周檄诸州。江南有许多明之遗民。且郑氏、吴氏余党隐居者也不少，迅速加入皇军的越多，两三年之间江南就可以完全解决。而后，乘胜而渐渐进取，不难荡平整个支那。既而至其极，即便是庸人也足以全统一之大功。^①

此外，为了确保能够制服中国，他还提出借助蒙古族即鞑靼的势力的策略。他说：

仔细考察世界形势，在四大洲中，土地广大、气候良好、物产丰富、人民繁盛的国家，实际上以支那为第一。然消灭支那的，每每出自鞑靼部族。由此可见，以鞑靼来制服支那甚为便捷。^②

用两三年的工夫以美食、醇酒来俘虏鞑靼人的心，使之成为“皇国的属州”。……皇国既得鞑靼，很好地抚绥其夷狄，以此众向南，支那国虽然强盛，岂可抗拒？愚蠢的满奴都能掠取支那，何况以皇

① 鸭田惠吉编：《佐藤信渊选集》，第407—409页。

② 同上书，第411—412页。

国的兵粮、大銃、火药的神威能不成为其后继者吗?十数年间统一支那全国,也不在话下。^①

正是因为上述这些思想,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为“兴亚的大先觉者”而备受关注。但是到晚年,他注意收集鸦片战争的情况,并在81岁高龄写成《存华挫夷论》(1849年),他的思想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对亚洲人和欧洲人的性质作了区分,认为“亚洲人崇礼行义,各自确然守其境界,侵伐他国、夺取他人之物之念寡,故而远涉海外以利欲为业者稀。欧罗巴人好利恣欲,欺夺之念深而贪得无厌。……欧罗巴人之心与豺狼全然相同,严密不可备者也”^②。这时,他对当时的满清怀有非常复杂的感情,蔑视、欣赏、同情、利用等意图在下文中和盘托出。他说:

满清亦夷狄也。英吉利亚亦夷狄也。然愚老欲挫英吉利亚而存满清者,以满清之一统中华、仁明之君数世继出,行奉天意之政,使中华之人民大量蕃衍,及古之三倍,故我有赏其功之意。且满清为当今世界之大邦,然不像蒙古的忽必烈那样凌驾我邦,且近来侈然自大而不务外攘之武事。故英夷侮之而率舟师来侵伐,战而屡屡大败,江南四省流血而满清不能自卫,只好割地赔款乞和。如此以往其国益式微之时,西夷贪得无厌之祸,将东渐而至本邦。故愚老希望满清的君臣苦心积虑,赈贫吊死,上下同甘共苦练兵数年,乃起复仇之义兵,征伐英夷而大破之,收复失地,完全攘除出东洋,这样满清可永远为本邦之西屏。^③

综观佐藤信渊上述关于中国认识的三个不同阶段,尽管他对中国的认识和态度在许多方面存在明显的甚至是根本性的不同,但如下两个基本的着眼点是不变的。第一,中国是一个强大的邻国;第二,日本的生存与发展与中国密切相关。这两个基本的视点,可以说在日本的中国认识

① 钁田惠吉编:《佐藤信渊选集》,第413—414页。

② 同上书,第355页。

③ 同上书,第355—356页。

史中一直到今天都没有改变。日本根据自身的利益需要, 无论是否切实可行, 或者依靠中国(结为盟国), 或者利用中国(作为屏障), 或者征服中国(称霸世界), 这些中国认识的基本类型, 早在明治维新之前就已经形成。以上述两个基本视点为前提, 各种各样的潜在的或既存的中国认识, 根据不同的历史状况或“主体”的需要, 其中任何一种都有可能一时成为主流。

三 中国认识变化的机制之一: 对象化中国

中国文化对古代日本的确影响深广, 但是至少到近世之后, 研究日本中国认识的变化, 就不能无视日本的“主体性选择”。日本自身的主体性选择是日本中国认识变化的机制之核心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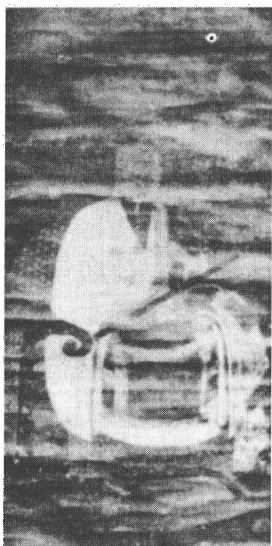
所谓“主体性选择”, 表现在日本中国认识的变化上, 具体而言有以下几层意义。

首先是将中国相对化、对象化, 或者叫客体化。日本之所以要将中国对象化, 是因为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太深, “唐风”或“汉意”已经融化到日本文化内部, 以致在某些方面有“与日本一体化”的倾向。丸山真男在分析佐久间象山的汉诗《读洋书》^①时, 认为这“表明象山打破了通过汉学而多年培养起来的‘东洋’与日本的一体化”, 高度赞扬了其“主体性选择”。^②而实际上, 这样的想法早在日本所派出的遣隋使携带的国书辞令中就可以看出。607年的日本国书中说: “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隋书·倭国传》), 而次年其国书改为: “东天皇敬白西皇帝”(《日本书纪》)。国学家本居宣长在《驭戎慨言》(1778年)中分析说: “在后一次的诏书中, 改日出处天子为东天皇, 日没处天子为西皇帝, 盖应闻首次诏

① 诗曰: “汉土与欧罗。于我俱殊域。皇国崇神教。取善自补阙。彼美固可参。其瑕何须匿。王道无偏党。平平归有极。咄哉陋儒子。无乃怀大惑。”此诗作于1844年。见佐久间象山《象山先生诗钞》卷之上, 《增订象山全集》卷二, 长野: 信浓每日新闻株式会社, 1934年, 第12—13页。

② 丸山真男: 《丸山真男集》第九卷, 东京: 岩波书店, 1996年, 第234、235页。

书为彼王所不悦,故略加改动,并表敬意。然犹不只称彼王为皇帝,对东而称西。我方既不称倭,亦不称王,犹称天皇,盖憎恶彼王国书中称倭王之无礼,不从之也。”^①如木宫泰彦所说,这时“圣德太子一方面向往中国文化,极愿试图吸取,而另一面又始终尊重国家体面,对隋坚持对等态度”。^②后来的日本遣唐使的派遣,也是在接受中国的朝贡体系的同时,还力图保持“外交上的自主、平等的态度”,并为此做出种种努力。^③



虎关师鍊画像

遣隋使最初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求佛法,而宋元之间,佛教在日本兴盛,日本不仅有许多入宋、入元僧人,而且中国也有不少禅宗僧侣到日本弘扬佛法。日本镰仓时代末期的五山文学的代表、临济宗僧人虎关师鍊(1278—1346),曾师事入籍日本的元朝僧人一山一宁(1247—1317),学问上所受惠泽尤多。其《元亨释书》(1322年)就是受其启发和刺激而作。该书以汉文记述了自推古朝“达摩渡来”佛教传入日本之说到元亨二年(1322年)约七百余年间各宗派僧侣的传记、评论及相关事项。这部著作不仅是日本佛教史的经典之作,在日本思想史中也备受关注。该书从信奉佛法的角度,将日本与印度和中国进行对比,认为日本最为优越。他说:“我国家,圣君贤臣相次间出,皆能钦歆我法。予博见印度支那之诸籍,未有此方

① 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胡锡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55页。见《增补本居宣长全集》第6卷,东京:吉川弘文馆,1926年,第160页。隋炀帝见到小野妹子所呈国书“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览之不悦,谓鸿胪卿曰:‘夷蛮书有无礼者,无复以闻。’”(《隋书·倭国传》)而隋史裴世清在回访日本时所带的国书中据说是以“皇帝问倭王”(《日本书纪》中改为“倭皇”)的口气,对此,《经籍后传记》载:“圣德太子甚恶其黜天子之号为倭王,而不赏其使。”(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第55页。)

② 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第55页。

③ 参见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第99—101页(“日本对唐朝的态度”)。

之醇淑也。何者？神世一百七十九万二千四百七十余岁，人皇二千年。一刹利种系联禅让，未尝移革，相胤亦然。阎佛界里，岂有如是至治之域乎？”^①此外，又从所信纯驳的对比来说明日本虽然面积比印度、中国小，但是“日域纯大(乘)无小(乘)”，盛赞日本为“东方醇淑大乘之疆”。其中同时提到：“佛言：东北方有无量住菩萨乘诸男女等。然经文繁衍，恐人不委斯旨。”对此他解释说：“佛说之东北方者，支那日本并之矣。何也？气候同也。见其气候之同，宜乎吾佛之并言之乎？曰：然则支那又大乘之域乎？曰：支那者大醇而小疵，日本者醇乎醇者也。”^②他还批评中国鬻爵贩牒卖号，是“补一时之小厄，貽万代之大疵”，相比而言，他强调：“我国家无是等丑，不特土俗之醇淑也，又奉佛者深之使然乎。”^③这种中国认识在日本的影响，可以从佐藤直方(1650—1719)的《中国论集》(1706年)中还提到了《元亨释书》中记述“日本为世界中之最上国，比唐天竺还要优越”^④可见一斑。

德川幕府建立之后，儒学(朱子学)逐渐成为维持幕藩体制秩序的官方意识形态。陶德民针对明治以后汉学者或“支那学者”的中国认识，指出人们容易设想因为其专业和兴趣而对中国文化有亲近感，那么如果遇到事情似乎就会站在中国一方，而强调“在东亚世界秩序因为近代西洋的侵入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的明治即晚清时代，这样的设想未必适合于所有的汉学家，有时甚至可能与事实大相径庭”^⑤。实际上，德川时代的

① 虎关师鍊：《元亨释书》(《新订增补国史大系》第31卷)，东京：吉川弘文馆，1930年，第242页。

② 虎关师鍊：《元亨释书》，第449页。

③ 虎关师鍊：《元亨释书》，第415页。《元亨释书》第414—415页还有如下记载：“赵宋初，谥天台智者法空宝觉尊者，或有四字六字师号，不遑枚举。高宗遭金虏之连劫乏经费，建炎二年十一月，敕卖四字师号，价二百千。……昔者孔子罕言利，况我辈乎？……乱离之主助一时之国用，我尚恕诸。买之沙门为谁哉？比丘之浮虚，至于斯矣。我按诛奸谀于既死之刀焉。昔汉武帝伐戎狄而国蹙，始鬻爵，史毁之。唐肃宗逢羯獠之寇而贩牒，祖述于汉武矣。宋之卖号，出于二主乎。”

④ 《山崎闇斎学派》，日本思想大系31，东京：岩波书店，1980年，第421页。

⑤ 陶德民：《明治の漢学者と中国——安繹・天囚・湖南の外交論策》，大阪：関西大学出版部，2007年，第1页。

日本儒学者接受朱子学,其出发点并不仅仅是为了“祖述”或弘扬朱子学及其所代表的中国文化,而在很大程度上,如韩东育所指出的,是利用朱子学的哲学观为日本寻找“主体性”和“利用朱子学的历史观为日本寻找‘正统性’”。^① 将中国对象化、客体化的情况早在德川初期的儒学者中就存在。

例如,藤原惺窝(1561—1619)在给其弟子林罗山(1583—1657)的信中就说:“本邦居东海之表、太阳之地,朝曦晨霞之所辉焕、洪涛层澜之所荡涵,其清明纯粹之气,钟已成人才。故昔气运隆盛之日,文物伟器,与中华抗衡。”^②可见藤原惺窝是用日本可以与中国匹敌的优越的地理人文、文物伟器来将中国相对化。另一方面,他还用“理”的普遍性和同一性来将中国相对化。林罗山记述惺窝之言曰:“理之在也,如天之无不峙,似地之无不载。此邦亦然,朝鲜亦然,安南亦然,中国亦然。”^③

德川幕府建立(1603年)后不久,德川家康于1610年即命林罗山起



藤原惺窝像

草文书致福建总督。其中说道:“日本国主源家康一统阖国,抚育诸岛,左右文武,经纬纲常,尊往古之遗法,鉴旧时之炯戒,邦富民殷而积九年之蓄,风移俗易而追三代之迹。其化之所及,朝鲜入贡,琉球称臣,安南交趾占城暹罗吕宋西洋柬埔寨等蛮夷之君长酋帅,各无不上书输贡,由是益慕中华而求和平之意,无忘于怀。”其修书的目的在于“索勘合之符”,为了达到此目的,说:“我邦虽海隅日出,抑谚所谓蕞尔国也。中华以大事

① 韩东育:《从“脱儒”到“脱亚”——日本近世以来“去中心化”之思想过程》,台北:台湾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63页。

② 《藤原惺窝 林罗山》,日本思想大系28,东京:岩波书店,1975年,第109页。

③ 同上书,第227页。